

封建社会妇女的缠足习俗，在枣庄地区也是非常盛行的。曾求学于济南女子师范的张笑寒小时候同样遭受了这样的痛苦，因为缠脚硬是缠断了两个脚趾。嫁人结婚后，张笑寒在婆家也遭遇了封建恶习的挑战，她坚决不让自己的女儿再受缠脚之苦。结果，她的女儿梁巾侠就成为当时峄县第一个保持天足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剪辮子的女孩子。

【口述城事】

□王祥林

张笑寒(1896—1993)，山东峄县人(今山东枣庄峄城)，其父张文源是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1912年被张勋冤杀于兖州；其母靠自学识些字，能看些鼓词、小说、词曲之类的书。张笑寒曾求学于济南女子师范，1928年—1932年任峄县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县立初级小学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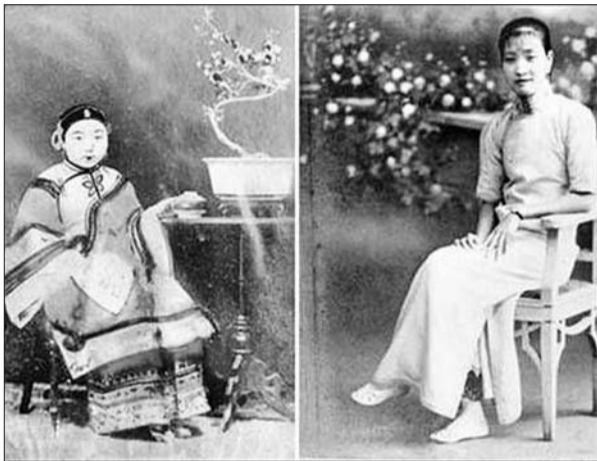
妇女缠足裹脚，必须从幼年开始，据枣庄地区一些老妇人回忆，小女孩从六岁开始，就进行缠足。为了使“天足”变小，用布帛将双脚掌紧紧包扎缠绕，其间卧床不起，经两个月的折磨，脚骨变形，甚至断裂，脚背隆起，十个脚趾被压在脚底，整个脚形又尖又小，弯曲如弓。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痛苦不堪。流传于枣庄地区民间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便是妇女缠足苦痛的真实写照。

张笑寒坚持到7岁还不缠脚，其母看周围亲戚、邻居的女孩子没有一个不缠脚的，才狠心开始给她缠脚，硬是缠断了张笑寒的两个脚趾。张笑寒带着缠脚的痛苦，17岁就嫁给梁家，不久生了大女儿梁巾侠。张笑寒在梁家也遇到了封建恶习的挑战，梁家的老人坚持要给她的大女儿巾侠缠脚。她怎么也不肯让步，坚决不让自己的女儿再受缠脚之苦。结果，她的女儿梁巾侠就成为当时峄县第一个保持天足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剪辮子的女孩子。

民国期间虽然倡导妇女放足，然而收效甚微。枣庄地区的天足运动也开展得不理想，据《渴口乡志》记载：原渴口乡地区(今齐村镇北部山区)，多系山区村庄，地瘠民贫，文化落后，接受新生事物较为缓慢，直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峄县公署张贴布告提倡女子放足，这是一般乡民首次听到的放足信号。1926年，张笑寒任峄县县政府放足会会长，带头不缠足。同时，县政府放足协会在各村庄张贴布告放足。

北伐军到达枣庄后，峄县成立峄县妇女协会，派专员到

张笑寒和枣庄天足运动



昔日的三寸金莲与天足运动后的解放。

各大村庄宣传婚姻自由、妇女放足。峄县妇女协会派张笑寒到齐村镇的郭村、侯宅子两村演讲宣传，收效甚微。直到1928年兴办学校，在校女学生开始不缠足，但一般农村少女、中老年妇女依然坚持缠足，山区村庄尤甚。

1928年，为了彻底解放妇女的双脚，张笑寒不顾那些不理解乡邻的嘲笑和反对，把正在哺乳的孩子放在家里，手拿三角小红旗到农村集市上宣传妇女放脚。每次宣讲，张笑寒在教说了妇女缠脚的害处后，便向广大妇女听众呼吁：“女人也是人，要争平权，得能独立，自己先争口气”。张笑寒每次宣传，都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她常常被听众围得水泄不通，时常有人搬个凳子来，叫她站上去讲，也有人端茶给她喝……曾担任过北京市妇联主任的李汝佩同志称赞张笑寒：“她(张笑寒)是枣庄妇女运动的启蒙者，我就从她的讲话里，才知道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权……”李汝佩回忆说，她听张笑寒宣传妇女放脚时，只有10岁，有好多话都听不懂。当时，李汝佩年届50岁的母亲也是张笑寒的忠实听众，她家附近的嫂子、嫂子、侄媳妇也都常去听宣传，听着点

头叹气地也感动，就是不行动。年届50岁的李母，听了几次放足宣传后，回家就不裹脚了，还到有女孩子的人家再做宣传：“可别再给孩子缠裹脚了，你听人家(指张笑寒)讲得多在理儿，咱自己还没受够这个罪呀！”李汝佩的母亲自己从此不再缠脚，也支持女儿不缠脚。

1934年春天，峄县教育局长孙稚亭再次邀张笑寒成立妇女放足会。张笑寒意识到，放足对峄县妇女还是很紧迫的事情。因为直到那时候大多数女孩还是小脚，一大批小女孩还在那里紧紧地缠脚。当时的所谓放足委员会，只有张笑寒一个人，牌子挂在农会的一间西偏房里。放足的事只能在城里宣传，就是出城也不过三里。尽管如此，张笑寒依然手拿三角小旗到矿区、集市等人口密集的地方宣传妇女放脚、妇女解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笑寒除积极支持子女参加抗日队伍外，自己也参加了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开办妇女训练班，为妇救会培养了一批基层干部。1939年日军对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大举扫荡，张笑寒因腿脚不方便，被动员疏散回家，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

天足运动：始于清末，天足即放足，是针对妇女的缠足而言的。“天”指“解放”的意思。

主要发起人：一是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克高望，他是废除缠足的天足运动发起人和领袖。1874年他率先在厦门建立了一个拥有60余名妇女的“天足会”——这是目前中国第一个有历史可考的反缠足组织。

第二个人是英国的立德夫人，1878年，她在上海也设立了“天足会”，并在无锡、南京等地设立分会，对“天足运动”有推波助澜之功。

位。

在张笑寒的宣传鼓动下，枣庄地区的广大妇女，深感缠足的痛苦，天足的幸福，妇女放足者渐行增多，曾广泛流传枣庄地区的《放脚歌》，就是这时的产物。《放脚歌》的内容是：“叫声我的姐呀，听我说话：几千年流传的缠脚恶习惯，把我们的十趾来缠断。缠得俺痛苦呀，实在难言。妹妹呀说得对，缠脚苦难当；走路过河无力量。前走走后倒倒站呀站不稳，你看大脚板走路多排场。女儿受得罪呀！想起来真冤枉；为什么亲爹娘不疼女儿郎。女儿缠脚的苦呀，实在苦难当。不叫俺出大门呀，整天在厨房。丈夫打、婆婆骂呀，一天哭几场，过得日子还不如牛羊。姐妹们联合起来呀，一同把脚放。参加妇女会呀，一齐把战抗。男女同看待呀，打退鬼子大家同解放。”

从歌词的最后一段可以看出，现实实践的需要也起到了枣庄女子放足助推器的作用。但仍有一些封建积习太深者，阻止妇女放足。新中国成立后，党与政府大力宣传妇女放足，禁止少年女子缠足，至此幼女全部不再缠足，并鼓励中青年妇女放足，缠足恶习才逐渐绝迹。

宣传委员陆晋如

【“中学忆旧”系列之四】

□安家正

陆晋如是俺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谁也想不到他是山大校长陆侃如的弟弟，因为两人年龄相差太大。

陆晋如潇洒洒脱，谈吐不俗，但很“另类”的是他的人缘极好。在我们那班，城乡学生之间充满隔膜，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城里同学大多走读，男女交往随便，嫌乡下同学“土气”；而乡下同学大多住校，自成圈子，与城里女生绝少交往。陆晋如却很个别，既可以跟乡下来的男生一块儿去洗澡澡；又常常应邀跟城里活泼开朗的女生一块儿去看电影。跟什么人地和睦相处，轻松自然，毫不拘谨。后来成为电影《甜蜜的事业》编剧的田芬，当年是“十大美人”之首，鼻孔朝天，居然请他一道去参加旅青艺术团举办的赈灾舞会。

陆晋如不常提到哥哥，可偶尔表态却谈锋甚健。有一次说到他哥哥：“他是误入白虎节堂！把学者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俗物上了。”他的哥哥就是陆侃如，当时极为罕见的学者官员。

在人们心目中，陆侃如和冯



陆侃如与冯沅君

沅君这对夫妻教授，是知识分子神往的天地绝配。然而，一见了面，现实把想象中的偶像几乎砸得粉碎。冯沅君这位既能写作又精科研的教授作家(笔名淦女士，五四时期名噪文坛)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个村妇一样在飞针走线补袜子，而陆侃如则坐在书案里埋头疾书，完全不知道弟弟陆

侃如是“汗脚”，淦女士为其所苦，竟不知道世上有尼龙袜子。他俩没有子女，房间显得过分空旷，静得无声无息。当然，垒到屋脊的书橱为小楼增添了浓郁的学术气息，还有那摞在门边的一堆木板箱，令我联想到报端的文章：这大约就是那十万张卡片的藏身之地吧！

不过，他们在物质生活上确实“低能”。慈祥的知识女性拿出糖果来招待我们，竟是存放久了粘在一起的过期货，冯先生剥纸也笨手笨脚的。

在青岛最后一次见到他俩，是在反右派斗争期间，陆侃如病了，我们去探视，只见冯先生在炖肉，怕我们见怪，先做解释：“政治上该划清界限，划清界限；生活上该照顾，还得照顾。我们不会离婚！”而陆侃如却只是凝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再见到陆侃如时已经是1962年了。那时政治气氛和缓，曲阜师院不仅让右派教师王锡昌等登台讲课，还邀请了陆侃如、高兰等到校开设专题讲座。陆先生讲《文心雕龙》博得一片喝彩。

我到招待所里拜访他，一见面他就喊出了我的名字，记忆力之强让人惊讶。于是开始了轻松而散乱的对话，自然说到了讲课。我讲了王锡昌教授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的原因是在宿舍里悬挂着与司徒雷登的合影时，陆侃如不假思索地说：“珍惜师谊，无可厚非！”锋芒毕露，丝毫不减当年。

“当年有人诋毁你是‘读类书起家’，晋如不客气地批评是‘文人相轻’！”这可能触动了先生，“我一向认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生读书奉张溥‘七录’(也做七录)为主。可惜我懒，未能‘七录’，但坚信‘借书不如抄书’，我是‘笨鸟先飞’，就做卡片。很佩服那些说我没系统学问的才子，可惜他们的学问怎么说也算不得渊博。读类书不一定没出息，但务广而疏，不做卡片容易忘，只好多多益善了。”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把这次谈话当成了五年之后的“补课”，一直作为自己治学的指导。我也多多益善地做起卡片来，“文革”中被焚烧，纸灰竟装满了半个小麻袋。

【民间忆旧】

收听评书的时光

□李玉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还很贫困。我们那地方还未通电，电灯都没见过，不用说电视机了。村里也无什么娱乐场所。当时最重要的娱乐方式就是听收音机。而评书联播则是男女老少都十分喜爱的节目。

那时电台每天中午都会播放一段评书。当时最著名的评书艺人是刘兰芳。她最拿手的评书是《岳飞传》和《杨家将》。刘兰芳嗓音清脆，字正腔圆，说起评书来飞动流走，给人一种爽脆淋漓的感觉。尤其是她那种语速极快、一气呵成、飞电过隙、骏马注坡式的“贯口”绝活，令无数听众赞不绝口。

单田芳先生晚出，一开始他那副“公鸭嗓”让人觉得不对味，但很快人们就被他那独特的嗓音所倾倒，成为忠实的“单迷”。单田芳先生说书声音洪亮，气势充沛。波澜壮阔的故事情节从他嘴里活灵活现地吐出，荡气回肠，扣人心弦。书中有大量独具特色的“单氏”格言警句，如“听人劝，吃饱饭”、“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有想不到的事，没做不到的事”、“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听众听了，无不点头称是，体会到了为人处世的道理。当时，一部《隋唐演义》响遍大江南北，倾倒亿万听众。

当时袁阔成和田连元先生的评书也脍炙人口，深受广大听众喜爱。那时评书每天只播一段，中午开始，晚上重播。人们只要听上几回，便如同吸了鸦片一样，上瘾了。每天中午，大人从地里收工回家，孩子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评书联播。一段评书只有半个小时，说到紧要关节，醒木一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每当听到这句话时，心里便好生遗憾，恨时间过得真快，感觉不过瘾。心里又挂念着下回的情节，在一种既享受又遗憾的心理下开始了各自的工作，期盼着第二天中午的各自到来。

农民下地劳作累了，中间歇息时，便三五成群，凑在一起，谈论评书情节。谈得兴高采烈，津津有味，不自觉地就进入了评书中。为杨七郎被乱箭穿身而痛心不已，大骂奸臣潘仁美残害忠良，一个不气脸脸庞，义愤填膺；为寇准智审潘仁美而叫好，为杨六郎手刃潘仁美而大快心胸，一解心头之恨；为杨宗保被困天门阵而忧心忡忡，为穆桂英何时打开天门阵而心急万分……

那时的评书爱好者中午收听后，晚上还要重听一遍，细加品味。偶尔有人中午未得听，晚上一定要补听。如果因为有事中午、晚上都没能听，心里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遗憾感，为这段未听评书情节着急，迫不及待地向问过之人询问未听内容。虽然听者把主要故事情节讲了出来，但未听者却还是为不能原汁原味地收听而遗憾好一段时间。

评书听得多了，自然会长知识，学语言。我至今仍记得一件小时候因听《隋唐演义》而使我“露脸”的事。那时我七八岁，春节时随父母到姑家串门子。由于是第一次去，街坊四邻都去看热闹，大人们一言他一言地逗我玩。其中一个人忽然问道：“你跟姑亲还是跟姨亲？”我本想说跟姑亲以博姑高兴就行。可就在此时，我的脑子里电光石火地一闪，忽然想起《隋唐演义》里秦琼认姑一段，单田芳那磁性的声音立即回响在耳际，我当即脱口而出：“当然跟俺姑亲。俗话说‘姑表亲，姑表亲，骨头断了连着筋。’”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大人们赞叹不已，纷纷夸我会说话。姑更是喜得合不拢嘴，多年后还常常提起。